

读《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

2000012983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宋聿辰 2000012983@stu.pku.edu.cn

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这其中，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交流与民间互动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十四项原则”充满厚望。参与巴黎和会的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认为，要实现废除《辛丑条约》中德国所得的权益、解决胶州半岛和青岛问题，必须要依靠美国的努力，而对同为巴黎和会主导国的英、法不抱太大希望^①。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上也写到：“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要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②芮恩施在向威尔逊的致电中甚至称“在中国人的心中，您（指威尔逊）已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希望和愿望的化身，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实乃前所未有的。”^③而另一方面，当巴黎和会的谈判结果传回国内后，巨大的期望转化为巨大的失望。陈独秀在5月4日的《每周评论》中写到：“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④民众对谈判结果的失望转变为巨大的政治力量，最终酝酿爆发出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中国的近代史由此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何中国人会对美国人抱有独特的好感和期望？为何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普遍认为美国应该在中国的事务上承担一些特殊的责任、扮演一些特殊的角色？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美国学界普遍认同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来解释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美国教授韩德跳出了之前的窠臼，将这一中美关系解释为“特殊关系”并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种“特殊关系”作了相关冷静、客观的分析。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⑤一书，最早出版于1983年，后在1993年翻译为中文版本《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⑥，作为由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被更广泛的引入中国的中美历史研究学界。汪熙教授认为这本书“破成说，立己见，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不但没有完全落入丹涅特和格里斯沃德的窠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跳出了费正清的框框”^⑦。作者在书中主要论述了中美两国门户开放关系的起源，展示这一政策的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人和中国人自18世纪开始接触一直到20世纪初的相互作用。长久以来，美国学

^① 王笛：《巴黎和会上的美国对华立场：山东问题解决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5期，92-109+282。

^②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第一期，第一版，1918年12月22日

^③ （美）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张玮瑛、曾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44~245页。

^④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二十期，第三版，1919年5月4日

^⑤ Hunt, M.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年

^⑥ （美）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笔者阅读的是该中文版本，下文均简称《特殊关系》

^⑦ 《特殊关系》，丛书主编前言，第1页

术界将“特殊关系”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无私”、“善行”和“保护中国”的同义词，将中美关系塑造成“又恨又爱”的家长式的模式。而韩德教授指出这一观点是历史的误解。这一特殊关系仅仅是两国民众的幻想：美国其实并没有对其自认为的那样对中国奉行无私的保护，反而在许多事务上与其它列强一样获得了特权；而中国执政者在中国受到列强欺辱时基于对美国的特殊看法而指望其保护和支持，却总是收获了失败的结果。作者从不同群体的视角出发，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考察介绍了中美两国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发展历程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

全书一共分为八章，又按照大致的历史时期将八章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介绍中美两国互相接触的开始，包括前两章。第一章主要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介绍门户开放支持集团——这一由谋取利益的实业家、渴望提高国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致力于中国精神与文化改造的传教士三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三个不同利益集团来到中国的时间以及不同的利益诉求，驱动他们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以不同的姿态进行对话，以及三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纠纷、写作与互相利用，同时还简要介绍了早期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第二章则转换到中国人的角度，介绍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与政府官员对美国的逐渐认识以及迷恋与警惕的两种态度，还叙述了早期华人特别是广州一带的中国人向美国（主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情况，排华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初见苗头。作者认为，中美直接接触的第一阶段，“以 1784 年‘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开往广州的著名航行作为开端，通常是和有利可图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①，但随着经济发展，经过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的相互影响，开始需要“解决双方的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②。作者敏锐地指出，交往初期产生的问题，包括利益冲突和文化价值冲突，在目前仍然是“表面的和无足轻重的”，但它们即将让位于“更明确的，最后甚至变为固定的相互作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最后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③。

第二编则主要介绍在初次接触后，中美两方互相利用、相互作用这一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部分包括三个章节。第三章介绍美国排华政治从初见苗头到发展到顶峰的过程，这既与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斗争有关，又与华人和当地居民的矛盾有关。第四章以琉球、朝鲜和越南三个中国的藩属遇到的危机为例，介绍了李鸿章为主要决策者主导的中国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倾向于把对清朝廷威胁最小的列强拉到自己一方以弥补其自身的弱势地位，而当时威胁最小的列强自然是美国，这一系列事件以李鸿章的策略完全破产而告终。第五章着重介绍门户开放集团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仍然分为三个利益集团来介绍：商人代表的经济企业、贸易利益集团在经历了萧条后开始复苏，并在面对欧洲列强和日本对中国更激进的瓜分政策时要求华盛顿给予更多的保护和政策倾斜；传教士与教会的活动向内地扩张，并在矛盾中逐渐引发中国国内排外主义的兴起；公使馆持有浓厚的家长作风，一方面认为美国人引导衰弱的中国度过骚乱时期的保护人和改革者，另一方面又进行调解或直接参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作者指出，“19 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文化交流的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但是伴随着更大规模的交往而来的是敌对和暴力行动的发生率更高”^④。作者在这一部分尖锐地将美国在这段时期发生的排华运动与中国发生的排外思潮

^① 《特殊关系》，第 2 页

^② 《特殊关系》，第 3 页

^③ 《特殊关系》，第 4 页

^④ 《特殊关系》，第 86 页

进行对比,在文化与经济发生冲突的背景下,太平洋两岸都发生了类似的排外运动,在中国是对传教士的诋毁和攻击并逐渐演变为义和团运动,最终引向了丧权赔款的辛丑条约,在美国则是对华工的排挤和打压并最终演变为严格的排华法案。韩德教授指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把要求中国门户开放和与之相对的坚决要求对中国移民门户关闭两者结合了起来”^①。

该书的最后一编主要介绍 19 世纪末一直到 1914 年左右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化,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实行变革,而美国仍然坚持门户开放思想并进行以分导者和保护者自居的家长式统治^②。这一编包括三章的内容。第六章主要介绍中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到民国初年,在经历政治与外交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方面从张之洞到袁世凯与美国方面从海约翰到威尔逊之间的外交博弈过程,这其中一方面是中国的决策者和外交官不断尝试利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来保卫中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决策者逐渐更强烈地以保护者的身份自居但同时保持更轻蔑的态度。第七章介绍了美国的排华运动在 19 世纪末达到高潮并引发了华人社区乃至国内沿海地区强烈的抵制情绪,并与之前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他们与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组成了更大的利益团体,以此来抵制美国的排华政策,但抵制运动仍然以失败告终。第八章分析了在 20 世纪初,面对中国的新的改革思想和对美国保护人身份的迷恋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三大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外交上,美国的外交官主张一项广泛的外交计划,“这一计划设想外国发挥一种重大甚至指导性的思想”^③,甚至对中国“延误已久的改革进行暴力干涉”^④;在经济上,决策者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转向更为积极地干预经济事务,但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在投资的基本目的问题上观点分歧”^⑤并最终导致了联盟的破裂,与之相对的是两家更注重市场的美国公司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作者指出,这两家公司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令持门户开放传统的美国人厌恶的反常关系——“要征服中国市场,公司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作让步”^⑥;而对于传教士,在经历了 1900 年前后的危机后,传教工作逐渐转移到世俗教育和改造中国文化而不是争取个别中国人入教,同时中国人也寻求缓和敌意,并对传教活动向教育和人道主义的转移表示欢迎和鼓励。

笔者认为,全书的内容均围绕“特殊关系”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作者首先总结了历史上中美两国人对“特殊关系”的认识,即认为“特殊关系”是“美国利他主义的援助和中国满怀感激的报答”^⑦,作者称之为“一种令人安心的神话”^⑧。随后作者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中美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特殊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按照“一种与上述普遍神话迥然不同的意义来说的”,“所谓‘特殊’是指两个截然不同的并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难分难解的冲突,而两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它们自己的误解和神话的受害者”^⑨。

在研究视角上,较之之前的研究,韩德教授更加重视中国方面的情况,而这一点在之前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比如韩德教授基于史料研究,叙述了李鸿章、

^① 《特殊关系》,第 87 页

^② 《特殊关系》,第 196 页

^③ 《特殊关系》,第 279 页

^④ 《特殊关系》,第 280 页

^⑤ 《特殊关系》,第 291 页

^⑥ 《特殊关系》,第 299 页

^⑦ 《特殊关系》,第 315 页

^⑧ 《特殊关系》,第 315 页

^⑨ 《特殊关系》,第 316 页

张之洞等清朝外交人士对中美这一“特殊关系”的审视和利用,分析了这些外交官对美国从产生认识到在接触中逐渐转变认识的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德教授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代表的不同时间段均倾注大量笔墨关注了在美华人移民的情况,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美国的排华法案的发展过程以及对在美华人这一群体的影响。笔者认为,作者将在美华人受到排华法案的约束和限制,和在华传教士受到的排挤和攻击尖锐地对立起来,中国的门户开放和美国的门户关闭形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照,这种写作手法颇具有创新性。

在研究方法上,韩德教授在分析一些史料的时候综合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学科知识。比如在第一编的第二章描述广州等地华工向美移民的发展过程和特性时,仔细研究了广州不同地区的人群在经济能力、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人群特征差异,将该地区按照地理和文化分为三个有区别的区域——三邑、四邑和香山^①。经济能力和文化上的差异最终在美发展为不同的会社和联系网,重视籍贯的倾向也影响了后来排华运动愈演愈烈时华人社群内部的分裂趋势。这一系列精细的分析方法使得作者能够分析和思考前人所未能考虑过的中美关系的特点。

汪熙教授在丛书序中指出,韩德教授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把意识形态因素引入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分析”^②。一些学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的美国历史研究学者在反越战的潮流下,对早期中美关系研究历史的再思考和再分析的结果^③。他们对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正统模式提出挑战。韩德教授在其另一本著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更为明显地使用了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若干因素和结果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总结。在该书中,韩德“试图以意识形态为视角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动机,对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提出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三种意识形态:美国人的使命感、种族等级观念、对革命的恐惧。”^④这本书相较于《特殊关系》一书更偏向重大理论研究,与《特殊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互为补充。

《特殊关系》一书最早出版于1983年,关于中美早期外交和民间交流的历史研究,在之后也有了大的发展,比如徐国琦教授所著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以民间交流而不是官方交流为重点,从另一个视角审视和分析了中美两国早期的交流历史。《特殊关系》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比如汪熙教授指出,《特殊关系》一书“着重分析了两国间文化的差异与相互撞击”,但“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以孙中山和共产党的例子作对照,指出“意识形态的因素显得苍白无力”^⑤。笔者认为,这其中还有着很多的问题值得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今,中美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中美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约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中美在过去的这一段“特殊关系”是有意义的。韩德教授在后记中对美国人提出告诫,“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绝妙地说明了美国人因为他们的独特经验和观点,是多么有可能忽视世界的多样性,反而将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归结为熟悉的、易于

^① 《特殊关系》,第67页

^② 《特殊关系》,丛书主编前言,第2页

^③ 金卫星:《中美关系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01):72-81.

^④ 郭华东:《迈克尔·韩德的治学路径及对我们的启发》,黑龙江史志,2013(15):118-119.

^⑤ 《特殊关系》,丛书主编前言,第2页

处理的东西。用国家的巨大力量来为这种错误的、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服务是一种危险。”^①而作为太平洋西岸的读者，如何看待和分析中美过去的“特殊关系”以及如何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以审视今天的中美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思考。

^① 《特殊关系》，第 329-330 页